



边疆史地丛书

LIANG HAN
SHI QI DE
BIAN ZHENG
YU BIAN LI
BIAN JIANG
SHI DI
CONG SHU

两汉时期的边政 与边吏

李大龙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

(黑)新登字第5号

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

李大龙 著

责任编辑：王爱琳

封面设计：安振家

责任校对：晓 峰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5.875 · 字数 135 千

1996年10月第1版 · 199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 000

ISBN 7-5316-2861-9/K·59 定价：7.00元

《边疆史地丛书》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它是由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国境范围时有变迁。在近代，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边境遭到了列强的蚕食鲸吞，边界线发生了频繁的变动。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边疆不是固定不变的。

从古代起，中国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就有密切的联系，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少差异。边疆地区在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这种差异和特点，规定了中国边疆史地可以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研究中国边疆史地，探索其发展变化真谛，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不仅是本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处理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边疆史地研究，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和民族关系等敏感问题，学术界一向把它视为禁区，很少有人问津，致使这门学科长期停滞不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了这套《边疆史地丛书》，希望能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和共鸣，从而把边疆史地研究推向前进。

丛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以本学科独特的方式，为巩固祖国的统一，加强各民族的团结，促进边疆建设，繁荣边疆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边疆史地学研究范围广泛，举凡边疆史地理论、中国历代疆域、边疆民族、治边政策、边疆开发、边疆文化、边疆外交、边疆政教、边疆海岛、边疆人物、边疆考古、边疆历史地理和近代边界变迁等，都在研究之列，其有关专著、资料和译稿，将陆续收入这套丛书之中。

中国边疆史地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一定有许多不足，甚至谬误，我们衷心地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1988年12月

目 录

一、西汉王朝的边政	(1)
(一)西汉王朝的疆域和边疆地区民族概况	(1)
1. 疆域	(1)
2. 边疆地区民族概况	(2)
(二)西汉王朝对边疆民族的统一和统治政策	(6)
1. 对匈奴政策	(6)
2. 对西域政策	(19)
3. 对东北诸族的政策	(25)
4. 以武力征伐为主的治羌政策	(27)
5. 对西南夷的经营	(29)
6. 对百越诸族的统治政策	(31)
(三)西汉王朝的边疆管理	(33)
1. 边疆民族管理体制	(34)
2. 边防管理体制	(36)
二、王莽的边政改革及评价	(42)
(一)西汉王朝末至新朝初期的边疆民族概况	(42)
1. 西汉王朝和匈奴的关系出现微妙变化	(43)
2. 西汉王朝在西域的统治渐趋不稳	(44)
3. 西南夷不断反叛	(45)
4. 西汉王朝对珠崖等地的放弃	(46)

(二)王莽的边政改革	(47)
1.王莽在摄政期间推行的边疆政策	(47)
2.王莽立新后的边政改革	(48)
(三)王莽边疆政策的评价	(52)
1.王莽边政改革的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	(53)
2.王莽的边政改革不是复古倒退	(54)
3.王莽的边政改革并未导致“四夷皆叛”	(55)
三、东汉王朝的边政	(57)
(一)东汉初期的边疆形势及东汉疆域的形成	(57)
1.初期的边疆形势	(57)
2.疆域的形成	(62)
(二)东汉王朝的边疆民族政策	(67)
1.匈奴政策	(68)
2.西域政策	(73)
3.以“以夷制夷”为主的东北边疆政策	(80)
4.以武力征伐为主的治羌政策	(84)
5.对西南边疆的经营	(88)
6.东南边疆政策	(90)
(三)东汉王朝的边疆管理	(93)
1.对西汉王朝边疆民族管理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94)
2.对西汉王朝边防管理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95)
四、两汉王朝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制度	(103)
(一)西汉王朝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制度	(103)
1.边吏的选拔制度	(103)
2.边吏的任用制度	(107)
(二)东汉王朝边吏的选拔和任用制度	(110)
1.边吏的选拔制度	(110)
2.边吏的任用制度	(114)

3. 东汉王朝与西汉王朝边吏选拔和任用制度比较	(116)
(三)两汉王朝边吏的作用	(119)
1. 边吏是维系两汉王朝和各边疆民族关系的纽带	(119)
2. 边吏是两汉王朝边防的建设者、巩固者	(122)
3. 边吏是内地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的传播者	(123)
附录一:两汉王朝重要边吏小传	(126)
附录二:两汉王朝特设边疆民族管理机构官吏简表	(158)
附录三:两汉王朝边郡太守简表	(172)
后记.....	(179)

一、西汉王朝的边政

(一) 西汉王朝的疆域和边疆地区民族概况

边疆地区是边政施行的范围，而在汉代的边疆地区分布着众多的部族，汉王朝对它们的统治政策构成了汉代边政的主要部分，因而有必要对西汉的疆域变化及边疆地区民族做一简要介绍。

1. 疆域

西汉王朝疆域形成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汉高祖刘邦建国至武帝初期为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里，西汉王朝的疆域较秦王朝时略小，主要是匈奴南下据有秦时五原郡和上郡、陇西、北地等故塞以外之地，南方赵佗据有南海、桂林、象郡等地；西南地区夜郎、邛等部族各自为政。

武帝至宣帝时期为第二个阶段，亦即西汉王朝疆域的形成阶段。这一阶段始于建元六年（前 135）而终于甘露二年（前 52），西汉王朝先后向周边各族发动了统一战争。先是建元六年（前 135）统一西南夷，置犍为郡；元朔二年（前 126）收复河南地，置朔方、五原二郡；元狩二年（前 121），统一河西，置酒泉郡；元鼎六年（前 111）置张掖、敦煌郡；同年灭南越，置南海、郁林、象郡、苍梧、合浦、儋耳、珠崖、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后进一步统一西南夷，置牂柯、武都、文山、沈黎、越巂诸郡；元封二年（前 109）置益州郡；元封三年

(前 108) 灭卫氏朝鲜，置乐浪、真番、临屯、玄菟四郡。后宣帝在此基础上致力于统一匈奴和西域，神爵三年(前 59)，在西域置西域都护，自此西域并入西汉版图；甘露二年(前 52)，匈奴呼韩邪单于上表称臣，翌年入朝接受西汉王朝册封。至此，西汉王朝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疆域基本固定下来，东起朝鲜半岛东海岸，西至帕米尔高原，北自贝加尔湖之北，南到今越南南部。

第三个阶段是元成哀平四帝时期，即西汉王朝后期。自元帝以降，西汉王朝逐步走向衰落，疆域变化不大，只是初元三年(前 46)放弃了今海南岛的珠崖郡。

2. 边疆地区民族概况

在西汉王朝广阔的边疆地区，活跃着众多的民族或部族，主要有北方的匈奴族及所属部族；东北有乌桓、夫馀、秽及卫氏朝鲜所统属的部族，西北有氐、羌、西域诸国及乌孙等族；西南有称为西南夷的诸部族；东南有蛮和百越诸族。下择其与西汉王朝联系较多者概述之。

匈奴族

匈奴族是西汉时期活跃在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中势力较为强大的一支。战国时分布在燕、赵、秦三国之北，秦时为蒙恬所败北徙，秦末“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楚、汉相争之时，匈奴大破东胡王，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收秦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①建立起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汉初，匈奴一直是威胁西汉王朝北部边疆安定的主要力量，也是整个西汉王朝时期的主要防范对象。甘露二年(前 52)，匈奴呼韩邪单于上表称臣于西汉王朝，自此之后匈奴接受西汉王朝的统治。

^① 《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 年版，下同。

乌桓族

乌桓是东胡的一支。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乌桓是以游牧为主的民族，活跃在匈奴的东部，西汉王朝初期臣属于匈奴，每年要向匈奴交纳一定数目的牛、马、羊皮，称为“皮税”。元狩年间，西汉将军霍去病击匈奴左地，乌桓降汉，汉徙乌桓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等郡塞外，为西汉王朝防备匈奴。

沃沮

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载，沃沮位于“高句丽、盖马大山之东，东滨大海，北接挹娄、夫馀，南与秽貊接”。高句丽、盖马大山即今之狼林山，由此可知，沃沮的活动范围大致在狼林山以东的今朝鲜半岛北部，西汉初期臣属于卫氏朝鲜。

高句丽

高句丽之名始见于西汉武帝之时。据《汉书·地理志》载，玄菟、乐浪二郡“皆朝鲜、秽貊、句丽蛮夷”。又载，玄菟郡有高句丽县，明确记载高句丽在今辽宁新宾县一带。从分布地域推断，高句丽在西汉初期应属卫氏朝鲜所统辖。

秽

秽原为秽貊中的一支。秽貊是今朝鲜半岛北部若干部族的总称，后随着各部，如高句丽、沃沮等逐渐分离，秽也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据《汉书·武帝纪》和《后汉书·东夷列传》载，元朔六年（前128），秽君南闾等叛右渠，领众28万口降于西汉王朝，汉武帝以其地置苍海郡。

西域三十六国

据《汉书·西域传》载，西域“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多，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西域三十六国具体指哪些“城邦之国”，史书缺乏明确记载，历来颇多争议。清人徐松认为，三十六国依次

为：婼羌、楼兰、且末、小宛、精绝、戎卢、扞弥、渠勒、于阗、皮山、乌秅、西夜、子合、蒲犁、依耐、无雷、难兜、大宛、桃槐、休循、捐毒、莎车、疏勒、尉头、姑墨、温宿、龟兹、尉犁、危须、焉耆、姑师、墨山、劫、狐胡、渠犁、乌垒等国。^①但是徐说中的“难兜国”，据《汉书·西域传》明载“属罽宾”，当不在三十六国之列；“乌垒”是西汉王朝设西域都护时始置，亦不应在三十六国之列。据《汉书·西域传》载，武帝时桑弘羊建议屯田轮台、渠犁，曾言：“故轮台以东，捷枝、渠犁皆故国”，由此可知轮台、捷枝当在三十六国之列。因而笔者认为西域三十六国应为徐说中去掉乌垒、难兜，加入轮台、捷枝二国。

西汉初期三十六国之中力量稍强之国有：大宛、姑师、扞弥、于阗、莎车、龟兹、温宿、尉犁、焉耆等国。据《汉书·西域传》载，“西域诸国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是亦农亦牧之国。西汉王朝前期西域诸国臣属于匈奴。

乌孙

乌孙是西汉时期活动在西域北部的游牧民族。乌孙初在敦煌、祁连之间，后为匈奴所逼，徙之西域，活动在今伊犁河流域广大地区，初属匈奴，后力量强盛，逐渐摆脱匈奴控制，“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②西汉前期乌孙成为西汉王朝抗击匈奴的联合对象。

氐

氐与羌是很早就活跃在今甘肃、青海、四川等地的古老民族，合称西戎。氐的活动范围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冉駹，据马长寿先生考证，即今之嘉戎，其东北即西汉水、白龙江、涪水上游等地，氐族

^① 参见《历代各族传记汇编》第1编，第318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② 《汉书》卷94下《西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下同。

的原始分布地和秦汉时的分布地即在这一地区。^① 据应劭《风俗通义》，西汉元鼎六年（前 111），武帝遣中郎将郭昌进攻氐人，置武都郡。

羌

羌族是以畜牧为主的民族，秦汉时主要分布在“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鄯善、车师诸国”^② 的广大地区，即今四川北部、青海、甘肃、新疆等地。下面所涉及的是在四川、青海、甘肃一带的羌族。羌在西汉前期臣属于匈奴，对西汉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

西南夷

秦汉时期活动在今西南地区（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民族统称西南夷。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据此可知当时我国西南地区分布着众多的部族，其中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徙、筰都、冉駹等部族较大。夜郎活动在今贵州西部、云南东部；滇分布在滇池一带地区；邛都分布在今四川西昌一带；巂和昆明分布在洱海周围一带；徙、筰都则分布在四川西南；冉駹分布在四川西北部。西南夷秦时即已归属中原王朝，西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再次统一西南夷。

百越

百越之名始见于楚灭越国之后，系指活动在东南沿海一带众多的越族系统诸部族。百越分布极广，“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③ 即今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

① 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②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 年第 1 版。下同。

③ 《汉书》卷 28《地理志》注。

州及越南中部以北地区都是其活动范围。秦汉之际，百越诸部互相兼并，逐渐形成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等几个大的部落集团。西汉初期，活动在今浙江瓯江一带的东瓯君长繇被封为东海王；活动在今福建北部、浙江南部的闽越王无诸也接受了西汉王朝的册封；活动在今广东、广西、贵州南部及越南中北部的南越是秦南海尉赵佗建立的地方政权等。西汉王朝初期，上述政权对西汉若即若离，至武帝时始为西汉王朝统一，置郡县而治。

（二）西汉王朝对边疆民族的统一和统治政策

西汉王朝自建立之日起即开始对边疆各族展开强大的统一攻势，但由于边疆地区各民族强弱不同，对西汉王朝的安定影响各异，因而西汉王朝对各边疆民族所采取的政策也不尽相同，在时间上也有先有后，下分述之。

1. 对匈奴政策

匈奴在西汉初即是西汉王朝的强敌之一，对西汉王朝政权稳定及北部、西部边疆的安定影响甚大，因而在整个西汉时期，西汉王朝一直把解决匈奴问题放在首要位置。

纵观西汉王朝和匈奴关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对抗—和亲—对抗—统辖的演变过程。西汉王朝的匈奴政策与上述阶段相对应，分别采取了具有不同特点的政策。

（1）西汉初至高帝七年（前200），是以武力征伐为主

西汉建国之初，国力较弱，故匈奴一直不断向南扩张，并插手西汉王朝内部的争权斗争，如诱降韩王信，参与陈豨、卢绾反叛等，对西汉王朝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鉴于此，西汉王朝对匈奴采取了以武力征伐为主的政策。汉高帝六年（前201），匈奴围韩王信于马邑（今山西朔县），韩王信降匈奴。翌年，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北征，首

败韩王信于铜鞮(今山西沁县南),乘胜北上至楼烦,后进击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但为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刘邦被围七日始用谋士陈平之计遣人厚赂单于阏氏,加之援军将至,匈奴遂解围而去。汉亦罢兵归。平城之围是西汉对匈奴政策的转折点,自此之后,西汉开始采用以和亲为主的对匈奴政策。

(2)高帝九年(前198)至武帝元光二年(前133),是以和亲为主

西汉王朝和亲匈奴的政策首倡于建信侯刘(娄)敬。据《史记·刘敬列传》载,平城之围后,匈奴“数苦北边”,刘邦苦于无计,问于刘敬。刘敬在为刘邦分析了西汉王朝和匈奴的情况后,建议刘邦舍武而用“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之计,即“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陛下以岁时汉所馀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子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此即和亲之策。

综合分析刘敬的和亲建议,我们不难发现主要包括三个密切相连的部分:①以长公主嫁匈奴单于,以求生子为太子而取代单于;②“以岁时汉所馀彼所鲜数问遗”,即向匈奴赠送大量匈奴所缺乏的物品,以求使匈奴在经济上对西汉产生依赖感,从而在经济上控制匈奴;③“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即不断派遣“辩士”前往匈奴,以改变匈奴类似“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未可以仁义说”的落后习俗,从而在文化上同化匈奴。

刘敬的和亲建议深得刘邦赞许,高帝九年(前198),刘邦“取家人子为长公主,妻单于,使敬往结和亲约”。^①自此之后至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西汉一直对匈奴采取以和亲为主的政策。西汉

^① 《汉书》卷43《刘敬传》。

王朝在这一时期的和亲政策主要包括如下几项内容：①以家人子为公主妻匈奴单于。西汉王朝对匈奴的和亲，史书虽屡有记载，但多是“许和亲”、“复言和亲事”之类，而真正嫁公主只有如下几例：一是高帝九年（前 198），“使刘敬奉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①二是惠帝三年（前 192）春，“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单于”；^②三是文帝时，“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③四是文帝后元三年（前 161），“复与匈奴和亲，而中行说复事之”；^④五是景帝五年（前 152），“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六是建元六年（前 135），武帝“许和亲”，另《汉书·武帝纪》有“朕饰子女以配单于”，由此可知此次和亲是嫁公主了。②送匈奴物品。西汉王朝送匈奴的物品主要是“岁奉”，西汉“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即每年送予匈奴絮、缯、酒、食物等匈奴缺乏的物品。此外，西汉王朝统治者也经常送匈奴单于许多贵重物品。如文帝前六年（前 174），文帝遣中大夫意、谒者肩送单于“服绣袷绮衣、绣袷长孺、锦袷袍各一，比余一，黄金饰具带一，黄金胥紩一，绣十四匹，绵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⑤ 等等。③遣“辩士”前往匈奴。西汉王朝是否向匈奴遣“辩士”，史书无明确记载，也多为治西汉与匈奴关系史者所忽略，但综合分析诸史书的有关记载，尤其是对西汉王朝派往匈奴的使者的记载，可以肯定西汉王朝向匈奴派遣过“辩士”。《汉书·匈奴传》有一段较为详细的西汉使者在匈奴的言行记载，下略引之：“汉使或言曰：‘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

① 《汉书》卷 94 上《匈奴传》。

② 《汉书》卷 2《惠帝纪》。

③ 《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另见《汉书》卷 94 上《匈奴传》。

④ 《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

⑤ 《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

者，其亲岂不自夺温厚肥美以资送饮食行者乎？’……汉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妻其妻。无冠带之节，阙庭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父兄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阳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到易姓，皆从此类。……土室之人，顾无喋喋占占，冠固何当！’自是之后，汉使欲辩论者，中行说辄曰：‘汉使毋多言，愿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穀，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引文中中行说是西汉所嫁公主的侍者，后降匈奴，“单于甚亲幸之”，因而可以说中行说此时是代表匈奴同西汉使者辩论。由上述记载来看，西汉使者和中行说争论的焦点是：匈奴俗贱老、父子同穹庐而卧、妻后母和无冠带之节、阙庭之礼等的好坏。对西汉使者来讲，提出这些问题当然是认为这些习俗不合“礼节”，希望匈奴改变这些习俗，接受中原传统的观念和习俗，以求匈奴在文化上与西汉趋于一致。此与刘敬建议中“使辩士风谕以礼节”是一致的，因而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使者即是担负着“风谕以礼节”的使命的。另从上引文中：“自是之后，汉使欲辩论者”之语分析，此类使者当不仅限于上述一例。

关于西汉王朝这一时期和亲匈奴的政策，古今论者颇多，或言和亲是屈辱的、投降卖国政策；或言是被迫的、妥协性的，目的在于缓和西汉王朝和匈奴的关系；或认为是企图通过联姻建立一种罢战言和的政治关系等，分歧较大，难相统一。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笔者认为是缺乏系统地分析这一时期西汉王朝和匈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关系和斗争，而多着眼于和平相处，还是兵戎相见，以及和亲政策对西汉王朝和匈奴关系带来的影响等方面，忽略了诸如刘敬和亲建议的目的、内容及其是否合理；西汉和亲政策和刘敬建议的关系；和亲政策是否仅仅是为了阻止匈奴南侵等